



带薪休假成“画饼”根在执法不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有媒体甚至推算出,公众每年可增收1至2个类似于黄金周的度假时段,有望年增收旅游收入500亿元。

翻翻法律不难发现,“带薪休假”本是一项法律权利——早在1995年起施行的《劳动法》中就有明文规定。2007年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更是具体规定了带薪年休假的操作程序。本该落实的法定权

利,为何出台多年后还要等上7年才能“基本落实”?个中原因,着实令人深思。

法律应当得到尊重,法律更应得到切实执行。有法必依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绝不应成为落实带薪休假权的动力,而只能是带薪休假权得到落实的附带结果。一个追求法治的时代,公权力部门理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对于中国来说,法律权威的树立、人权保障的实现,远比每年几百亿元的经济收入更重要。法治思维不同于经济思维之处,就在于法治优先。

当然,法律权威和人权保障并不排斥经济收入,相反,法治还是增收的基础与有力保障。《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只是一张旅游业的发展蓝图,它并不是法治发展的蓝图。虽然“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但我们并未看到保障权利实现的具体路径。这张旅游业的蓝图也不可能提出应对“带薪休假”形同虚设的具体举措和方法。有法尚不依,一纸“纲要”又如何能让企业或用人单位心甘情愿地积极保障职工带薪休假权?

回过头看,“带薪休假”之所以沦为纸上画饼已多年,表面上似乎是劳资双方权益与地位的不平等所致,但这背后,仍与劳动执法部门的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紧密相关。劳资双方天然不平等,劳动法向劳方倾斜,是理顺劳资关系的必需。而如若法治不彰,资方恣意违法劳动者却得不到执法部门的救济,权利虚置就成为必然。不要期待资方的道德发现,先落实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的法律责任制度才是正途。

所以说,一纸“纲要”落实不了“带薪休假”。权利保

障还得回到法治的原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每逢岁末年初,舆论对“欠薪”总是格外关注。其实,“欠薪”和“欠假”一样可恶,一样伤害了劳方的基本权益。“欠薪”要整治,“欠假”同样需要整治。这里所说的“整治”,本是法律本身的要求,而绝不是基于发展某个产业的需要。希望各级劳动监察部门能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希望各级司法部门能够发挥司法监督应有的作用,这样,被“欠假”的劳动者才会越来越多地敢于向企业的不法行为说“不”。 □王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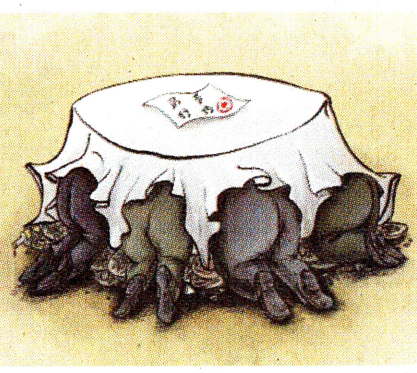
公务宴请“隐身埋名”

随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落实,大张旗鼓的公务吃喝之风得到遏制,但铺张浪费仍然存在。据媒体调查,有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还有一些公务宴请“隐身埋名”,宴请

单位成了一些酒楼的最大机密。

这正是:一纸禁令嘴边念,食客辗转上里间。添酒回灯重开宴,谁人知是公务宴。

□曹一 三宝



小品不要总是讽刺弱者

艺术作品应该取笑人性的弱点,而不应该取笑人体的缺陷,这是正常艺术与恶俗艺术的界分线。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春晚小品节目,并对赵本山、蔡明等表演的小品节目多有批评,批评主要针对小品中歧视弱势群体、嘲讽人体缺陷的内容。

我2008年看过春晚之后,给新京报写过一篇《从赵本山卖拐到蔡明卖楼》,批评二位表演艺术家小品,目光向下,嘲讽的多是弱势群体。而在更早的春晚,1994年,黄宏与侯耀文表演的《打扑克》,内容嘲笑的是官场与职场中的腐败之风,对这些潜规则或不良作风进行揭露与抨击,不仅可以博得人们一笑,还可以起到某种净化世风的作用。而近几年我们看不到这样内容的小品了,不仅如此,一些小品开始沦为对弱势群体的嘲讽与搞笑。

今年蔡明表演的小品叫《想跳就跳》。“蔡明”这位退休的老文化干部,对街道里

身材不高却痴迷舞蹈的老人,从身材到舞姿,无不刻薄嘲讽,最后却以高贵的姿态,来同情弱者,用掉他人手机,来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这样的离谱而畸形的同情心,不知道想表现什么?就是为了搞笑与取乐?

艺术作品应该取笑人性的弱点,而不应该取笑人体的缺陷,这是正常艺术与恶俗艺术的界分线。

人类伟大的艺术作品,甚至正常而普通的艺术作品,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对弱势群体表现同情心,而面对权贵保持应有的距离与批评精神,如果要取笑,也是对权贵的取笑,如果要表现,也是表现那些卑微的人们,内心却有着常人难以发现的美德。然而,一些小品相反,总是枪口向下对准弱势群体。

转型中的社会,各种现象千奇百怪,艺术家只要多关注社会,用批评的眼光去挖掘强势人群在转型社会中人性弱点,小品就会更具力度,更受百姓喜爱。 □吴祚来



市长走不走,能否多听听民意

在凛冽寒风中,山西省大同市的众多市民自发地来到市中心广场,以签名和举横幅等方式,希望即将调任太原市代市长的耿彦波能够留在大同继续工作。

时间倒回5年前,走马上任大同市市长的耿彦波,主导确定了将3.28平方公里的大同市恢复明代古城风貌的城市规划,并亲力亲为拆迁、开工建设等具体事宜。很多大同市民都曾亲眼见过耿彦波骑着28式自行车巡视工地,半旧的皮鞋里一倒半鞋土的形象。而现在,规划中的古城复建仅仅初

具轮廓,颇有口碑的主导者耿彦波就要履新,大同市民心中的惋惜与不舍自然溢于言表。

大同市民对这样一位父母官的朴素情怀表达,除了让我们生出山西有位好市长的欣慰,更多的是对“人走政息”的担忧和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反思。

这不是无妄的担心,因为众多城市都存在城市规划跟着“一把手”走的问题。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每隔几年便要调动的情况,让本应指导一个城市10年甚至更多年的建设规划频繁更改。正是这种城市规划“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

让民众将建设美丽城市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有一个好市长”,而不是一个科学合理、能够正常延续的发展规划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看待大同市民挥泪留市长的行为,就不会觉得滑稽,而是可以理解了。

眼下,全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大面积换届、调动,如果山西省委组织部能够多听听大同市民的声音,给这一电视剧般的情节一个大圆满结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大同市民看到政策延续的希望,更在于让民众真正看到“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用”的可期。 □付纲

DUSHU

读书



初春时节,正当为当年倡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吴江先生去世恫悼不已的时候,2月14日(正月初五)凌晨1时31分,陕西籍的著名诗人雷抒雁也在与病魔抗争十载后无奈地离开了人世。闻此噩耗,不由想起1979年,自己曾经含泪朗诵过他为张志新所作的小草在歌唱:“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青松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时,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特别在“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这样的诗句,当年曾温暖过多少人的心房,激发起多少人从现代迷信中觉醒和奋起。

一位朋友曾说:“那是淋漓着鲜血的正义呐喊”。记得当年《小草在歌唱》刚问世时,我还在乡下的一个中学里求学,就被这充满自责和反思的另类诗歌深深感动,工整地将全诗抄写进日记本中,与叶永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和郭沫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吟诵和镌刻在思想的深处。

小时候总盼望着过年。原因是过年能“吃白馍砸核桃”。如今最怕过年,因为过年实际上是“过难”。过年常让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结果是身心疲惫,还要徒增一岁,实在是无趣。基于此,今年过年我索性哪都没去,静守书斋,美美地读了几本书,总算是过了一个丰饶而又有意义的春节。

春节里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贾平凹的纪实散文《朋友》。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寂寞地躺了好几年。这次之所以忽然想到它,完全是因为心境使然。年前经历了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有郁结。所以读这本书最初的动机是想用它来遣怀。《朋友》是一本沉重而又厚实的大书,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它文字多、篇幅大(138篇文章、23万字),更在于它内容的博大、丰赡与深刻。什么是朋友?作者说:“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

雷抒雁走了:小草依然在歌唱



雷抒雁

处。34年过去了,多少往事如烟消散,然而,《小草在歌唱》这首散发着解冻年代对摆脱阴霾渴望的经典华章,却如同一把锐利的尖刀,将那个场最牢牢记在每个人的心底。

雷抒雁的沉痛反思,让无数的国人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不同思想、不同言论的残忍程度出乎意料,为什么在中国的朗朗天空下会发生张志新的悲剧乃至文革这么一场浩劫。记得时任辽宁省委的任仲夷书记,不仅顶住压力,力主为张志新平反,还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应该保障的基本权利,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来定罪。铮铮铁骨

掷地有声,这就是那时期体制内正能量和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

正是由于诗人的呐喊和正直的政治家的担当,才有了后

来的波及全国上下的思想空前大解放,而拨乱反正,致力于纠正文革错误,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开创了迄今仍为人们广为称道的1980年代。然而随着20世纪的远去,创造了新时期辉煌的璀璨群星中的巨星早已陨落,当年的青年才俊也陆续谢世。至今忆起似乎有“闲坐说玄宗”的感觉,令人唏嘘不已。

可悲的更在于选择性遗忘的结果,使不少现在的年轻人感慨如果不是互联网,他们甚至不会知道张志新是谁。匪夷所思的是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在祖国的西南腹地上还上演了一出所谓的“唱红打黑”的闹剧。

当年是雷抒雁这些诗人杜鹃啼血般的呼唤和任仲夷这些先贤们的努力,使我们曾经拥有了一个美好的春季。他们的离去,让我们在初春时节感到了深深的寒意,尽管他们那些沉郁炽热的诗句和有口皆碑的事迹早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坐标。雷抒雁最喜欢的诗人雪莱曾经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或制度的有益改革的斗争中,诗人就是一个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因为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口,可鸣春的燕子又在哪儿呀?真诚地希望:雷抒雁走了,小草依然在歌唱。 □郝振宇

春节归来说读书

个人的事。快乐来了,最快乐的是自己。苦难来了,最苦难的也是自己。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丰子恺先生画过一幅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表达的便是这种境界。在另一篇题为《五十寿宴上的讲话》的文章中贾平凹又写道:“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是在前边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劲;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边推我,给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正反反两股力量的作用,成就着我。”贾平凹不愧是贾平凹,他对世事、人情的理解是如此地深邃。也只有像他那样“高朋满座,进进出出,知人阅世,经多见广”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深刻、通透的文字。古人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又说:学问深时意

气平,精神到处文章老。今天我总算明白这个道理了。好书不妨隔年读。

春节里我读的第二本书是《傅雷文集·文学卷》。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在介绍西方文学方面卓有建树,为世所称。他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事实上傅雷不仅是一个翻译家,还是一位相当成功的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只不过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常被其翻译家的荣光所遮掩。傅雷先生学识广博,厚积薄发,除文学外他还兼通美术、音乐等多个艺术领域。更重要的是傅雷先生是一位思想迥异、个性鲜明,不人云亦云、坚持真理、特立独行,有着良好品行和精神操守的人。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频发的“房叔”“房媳”“房妹”等“房×”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想。近段时间,福建、江苏等地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产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约束。媒体称这在此前已出台的规范中并不多见。

事实上,规范房屋信息查询本是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一些地方针对“以人查房”所新推的规范,谈不上是什么“新规”。相反,多项法律对泄露房产信息还规定了具体的罚则。如《档案法》就明确,“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律上,房产登记信息正是归属于“国家档案”。

另据住建部《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单位和个人可以公开查询。这里的“单位”和“个人”,被明确限定在“房屋权利人”、“房屋权利人的委托人”以及国家负有特定职能的执法部门。非法律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不能随意查询。

按说,规范房屋信息查询本是落实法律,但多数民众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一份网络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网友认为官员的房产不是隐私,应该随便查。当相对封闭的查询制度与公民的知情权相互冲突,问题就应运而生了——虽然多数“房×”曝光背后,都有涉嫌“违法”查询房屋信息的情况。但公众更愿意接受“房×”贪腐行为被曝光之快,而不满于涉嫌泄露房屋信息的工作人员被查处之痛。

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方案,当然还是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化。但这并不表示,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面对众多明滋暗长的“房×”,反腐部门就无能为力。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虽然面向社会的官员财产公开尚未法律化,但体制内部的官员财产申报却已然实施了近二十年。官员既有申报,反腐部门就应按图索骥,利用既成的房屋信息查询系统,做好信息的核实工作。但遗憾的是,似乎很少听说过反腐部门借助于房屋信息查询发现了某位“房×”。多数民众不理解甚至反感于“严控用姓名查询他人名下房产信息”,其背后正指向有权查询的部门不作为,而又不让最具反腐热情的公民有所作为。

“房×”事件频发,对于公权力部门而言,其反思绝不应停留在封堵上房屋信息查询的“漏洞”。恰恰相反,应实质推进的,其实是公民监督和遏制腐败的有效路径。中央多次强调要“创造条件让民众监督和批评政府”。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规范查询房产信息无可厚非,但也要拿出让“房×”们无法藏身的制度和行动,以消除民众对“涉嫌保护‘房×’腐败官员”的误解。 □辛竟



严控『以人查房』,谁查『房叔』『房媳』?